

骑车去人民大会堂

—— 一个有关“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的行动

○ 董山峰

2011年3月的一天，母校的一位工作人员打电话给我，问我能否出席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并告知此项活动是在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领导人、校各级领导、各界校友都出席。听到电话，我马上答应，没有丝毫犹豫。答应的语调是镇静平和的，但内心却是潮浪奔涌。

母校这个电话对我来说是多么特别的荣誉啊！

在我的家庭中，我的母亲从没有很隆重地过过一次生日。以前是因为穷，能有个温饱的生活已经是很快乐的事了，过不过生日并不在乎。当家庭条件逐步好转以后，我们兄弟姐妹也曾经为母亲办过简单的生日，但都远说不上隆重。原因之一是，母亲的身

体不太好，赶上生日期间生个病输个液什么的，我们要把主要精力用于抢救她，其他自是次要的了。即便母亲生日期间身体没什么问题，我们也不敢把生日的动静搞得太大，生怕把母亲累着。一家人共同吃顿打卤面，再说一两句祝福的话，母亲就已经高兴得不得了了。正因如此，每每想到母亲的生日，我的内心总是充满歉疚。我自己生活再苦，工作再累，也愿意让母亲过得快乐。

接到母校的电话，我很自然地想到了自己与母亲的情感。想到自己对母校很少贡献，在事业上没有很多成绩，不能像很多优秀校友那样给母校带来荣誉，我对母校能邀请我出席百年校庆期间最高规格的大会感到受宠若惊。我想，待学校发出正式通知，我是一定要去的。再没出息的孩子，只要母亲召唤，也应当及时出现在母亲身边，哪怕只是陪母亲说说话，帮母亲锤锤背，或者为母亲助助威、壮壮胆。

那天，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我会早点起床，找一身适合运动的衣服，骑自行车去人民大会堂。

自从1994年到光明日报当记者以来，我有过很多次到人民大会堂出席活动的经历，其中以骑自行车前往的次数最多。

光明日报是个与共和国同龄的老单位。其创办者、领导者和员工不乏名人大家。其中包括章伯钧、胡愈之、杨西光等。其中第一位曾任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农工民



董山峰在莫斯科参加世界铝业大会采访



主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二位曾任新中国首任国家出版总署署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第三位1978年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时，参与组织修改和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引发全国开展“真理标准”讨论。我刚到光明日报的时候，从光明日报各种管理制度，还能依稀感受到当年章伯钧、胡愈之、杨西光等前辈留给我们的体制财富。比如，记者出去采访，只要提前一天要车，单位基本都能保证。如果要车人太多，司机班就提前出发，分送多人，然后在车上临时商量出一个时间表依次接人。再有特殊困难，就安排记者坐出租车，然后交通科长签字报销。虽然有这些方便条件，我还是喜欢骑自行车到处采访，有时能从市中心的光明日报社直接骑到西三环外的香格里拉饭店，单程就要一个小时。后来，记者有私车的人多了，社会上有私车的人多了，道路的拥堵状况加剧了，而报社司机班的管理也不容易了。往往是单位有一大堆车闲在车库，而没有司机能够出车。这种情况在中央新闻单位和有计划经济色彩的老单位也算普遍现象。这时，我骑自行车采访反倒有了更多优势，起码不堵车呀。目前，随着北京拥堵的加剧，在北京四环以内这个范围，我觉得还真没有什么交通工具比自行车有绝对优势。

我骑自行车采访主要还是图方便，哪里有点什么事，想看看就看看，想问问就问问，想照相就照相。真有急需，把自行车往路边一扔，再选择最便捷的交通工具也不迟。



董山峰在广西崇左革命老区采访孩子们

说起人民大会堂，我骑车到那里参加过上百场新闻发布会、几十场报告会、十几届全国两会的采访，2009年因参加中宣部国庆60年新闻宣传协调工作还在那里受到过中央政治局全体常委的接见。（2011年因获得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荣誉称号也在那里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2013年4月校庆前补记）而我的自行车也在人民大会堂安然处之。早些年是在东门有一排自行车，有专人看管。后来是在南门设存车处，也有专人看管。再后来因自行车的价值不再被人看重，南门只设存车处但无人看管，而东门外已经极少有自行车，每次我骑车到那里参加活动往往只有我这一辆，受到东门警卫战士的特许，放在他的眼前，从没有丢失过。你想，谁敢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在警卫战士的警惕目光中，偷走一辆并不值钱的自行车呢？

母校要求我们“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我是个容易发胖的人，经常骑自行车有助于我在紧张的工作中保持健康；母校鼓励我们要“清芬挺秀、华夏增辉”，我骑自



人民大会堂

行车能发现很多的新闻线索，用自己的新闻作品为推动国家和文明进步出一点力，增一点辉；母校教我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和“行胜于言”，我骑在自行车上奋力前行，了解百姓与社会，发现世情与新闻，能不断体会“自强不息”的内涵，感悟“厚德载物”的境界，践行“行胜于言”的校风。

对于母校“爱国奉献、追求卓越”的传统，我觉得，爱国奉献本身就不鼓励我们在物质享受上追求卓越，只有在爱国和奉献上达到的高境界，才能叫卓越。而过于追求物质享受其实是影响实现卓越的。在这方面，很多清华学子的工作和生活是堪称卓越的。而我，在爱国方面虽满腔热情，但在事业上却少有建树，当然离卓越更远。越是这样，我越要注意用好自行车，在努力工作和踏实生活中继续追求卓越。

这里还想说说我所了解的一些在新闻界工作的清华人。我1989年是作为清华大学中文系科技编辑专业首届第二学位生毕业的。我们进校时都是普通理工生，根本没想到日后能从事

新闻工作，是1985年以理工为主的清华恢复人文院系，才有了跨系攻读第二学位和日后从事新闻工作的机会。在我们前一届，清华中文系培养过一个班的科技编辑专业本科生，其中有一位杨健就分配到光明日报工作，尽管后来出了国，但他为复建后的清华中文系向中央新闻媒体输送毕业生开创了先河，也为师弟师妹增强了信心。现在，我和我的同学高建进、以及中文系86级的张碧涌等都在光明日报工作，他们两位在业务和综合素质上都很好，对母校的感情都很深，在光明日报的口碑都很好，发展得都很好。此外，从清华不同专业先后来到

光明日报的还有赵爱武、阎磊、刘书永、邓晖等。从我了解的情况看，他们的业务都相当不错，且为人厚重，使得光明日报同事对于清华大学的毕业生颇有好感。在人民日报，我们中文系的毕业生杨健（与前述杨健只是同名）、任建民等都很踏实、很出色、很受关注。此外，在日常采访中，我还遇到过不少出自清华不同系科的新闻从业者。在我们这个行业，要想像经济界校友那样抓住机遇一跃而出成就大业是很难的（当然经济界校友有那样机遇和能够抓住的人也是凤毛麟角）。所以，我们中虽然有的进步快一些，有的进步慢一些，但总体上都在不断努力，甚至是艰苦地努力，在发展自身的纵向维度和克服一个个困难的横向维度上追求卓越——我以为，这就是真正的“自强不息”，是最有意义的生命活动，是世界前进的动力。■

（作者198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工系和中文系。现为《光明日报》经济部副主任。此文于2011年4月应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纪念专刊约稿撰写，2013年校庆前略作补充。）